

福州明清会馆类型特征及其社会功能研究

王隽彦

(福建工程学院 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8)

摘要:福州是明清时期中国东南沿海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集中出现了一批客籍会馆。这些会馆主要分为行政会馆、商业会馆、科举会馆三种类型,并根据自身特征和业务需求进行城市的选址分布。在福州近代社会转型的特殊阶段,这些会馆起到良好的联络乡谊、促进商贸、传承文化、倡导信义等作用,同时也是福州明清时期社会管理的重要补充力量。

关键词:福州;明清会馆;类型特征;城市分布形态;社会功能

中图分类号: TU-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4348(2019)05-0448-05

A study on the types, characteristics and social functions of Fuzhou's guild hall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ANG Junyan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Fuj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Fuzhou 350118, China)

Abstract: Fuzhou was an important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center along the southeast coast of China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a number of guest guild halls were concentrated there. Generally speaking, these guildhall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administrative guild halls, commercial guild halls and imperial examination guild halls. The locations of these guildhalls were chosen and distributed according to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business needs. In the special stage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Fuzhou in modern times, these guilds played a great role in fostering local friendship, promoting commerce, inheriting culture, advocating faithfulness and so on. At the same time, they were also an important supplementary force of social management in Fuzhou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Keywords: Fuzhou; guild hall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ypes and characteristics; urban distribution patterns; social functions

会馆是明清时期融合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推动经济发展和促进地方社会有序管理的民间社会组织之一,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特殊的时代产物,它是在地缘观念和业缘观念共同影响下,自发形成的社会力量结合体。福州作为明清时期中国东南沿海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集中出现了一批客籍会馆。本文对福州明清会馆的类型特征、城市分布形态进行梳理,并对其社会功能做初

步归纳,试图展示这些会馆在福州近代社会转型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以深入了解和认识福州明清会馆历史文化价值,促进当代保护和活化研究。

一、福州明清会馆的类型特征

明清时期,福州的会馆主要是由客居在福州的官绅和商贾集资购地兴建的。最初兴建目的在于寄托乡思、联络乡谊,后来随着会馆的发展壮大

收稿日期: 2019-03-02

基金项目:福建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2018年年度项目(FJ2018ZTB011);福建省教育厅社会科学基金项目(JAS180278);福建工程学院科研发展基金(GY-S17111)

作者简介:王隽彦(1979-),男,福建福州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与美学。

和数量增多,其类型日益丰富,概括起来主要分为行政会馆、商业会馆、科举会馆三种类型。

(一) 行政会馆

传统籍贯观念是中国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观念意识,它产生于人口的流动之中。^{[1]6}因此,在封建社会中,地缘意识对人们的影响十分深远。从明代开始,代表不同地域利益的集团甚至可以左右政治的发展。这些相同地域的官员或贵族为了在全国各地壮大和维护自己的利益,往往会在重要的城镇设立行政会馆,以强化在当地的区域性政治影响,这些地域性行政会馆大到以省为单位,小到以县为单位。福州地处我国东南沿海,自古以来就是福建首府所在地,是福建省乃至东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尤其“五口通商”之后,福州成为封建中国对外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的窗口,政治和经济地位更加显著。福建各府县乃至全国各省纷纷在福州设立行政会馆。这些会馆一般只对同籍的官绅、商人、应试学子等开放服务,显示出较为浓厚的地域性倾向。

例如八旗会馆,又称奉直会馆(见图1),最早的时候是明代督舶太监高濂游乐之所——“中使园”,又称“西园”,清朝中期作为奉直奉天、直隶两省官员来闽交流游玩、居住的会馆使用,因多为满人居住,故被称为“八旗会馆”。据史料记载,八旗会馆主体建筑前后分为五进,主要有厅堂、戏台、酒楼、花园、花厅、亭台楼阁、仓库等,总面积约5000余平方米,建筑样式带有明显的京津一带建筑特征。现存厅堂面积约360平方米,长方形布局,四周围有白色风火山墙、重檐歇山顶、穿斗式木构架,厅内保存有完好的清代藻井。八旗会馆的厅堂十分宽敞,大约可同时容纳500人宴席。厅堂的南向坐落有戏台,戏台三面均有雕刻精美、寓意深刻的吉祥花鸟图案隔扇。

(二) 商业会馆

商业贸易繁荣是一个城市兴盛的标志。明清时期各大商贸城市都有很大规模商业会馆,并逐渐成为会馆发展的主流。福州作为最早的开埠城市之一,是清王朝的商贸重镇,商帮汇聚、百业昌盛,商业会馆也成为各大商帮在福州展现实力的舞台。各地商帮财团根据自身经济实力和地域特点,选择经营的业务范围和商品贸易。如兴安会馆具有强大经济实力,经营范围涵盖了京果、百货、烟酒、进出口、运输、侨汇等行业;浦城是福建



图1 福州八旗会馆

Fig.1 The Eight Banners Guild Hall in Fuzhou

的北大仓,浦城会馆则主要经营大米、木材、纸张等特产;又如福鼎会馆、寿宁会馆经营茶叶,古田会馆经营大米、红糍、薪炭等。

会馆建筑也是商帮的实力象征。商业会馆通常雕梁画栋,建造巧妙,用料考究,气派非凡。同时,这些会馆也是商帮的思想价值、人文精神、道德观念以及财团实力和协作精神的集中体现。他们注重商人“敦信尚义”的整体形象,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建立近代商业管理规则,这对近代后期复杂繁乱的社会环境具有一定的民间规范作用。

其中古田会馆就是福州商业会馆的典型代表,见图2。古田会馆处于台江双杭商贸区的核心位置,紧邻福州的货运码头,水陆交通都十分发达,并伴有大型的存储仓库,有利于大宗货物的囤积与中转。会馆于清光绪二十四年置地,民国三年竣工,共计10年时间。会馆坐北朝南,占地683平方米,由主落和次落两个部分组成。会馆建筑设计巧妙,为“穿斗式”木结构,结合“减柱法”建造,各建筑单体又彼此结合,以获得更加合理的使用空间。立面为象征“忠、义、节、气”的牌坊式门楼,高大雄伟。同时馆中雕刻丰富,工艺精湛,反映了中华传统的艺术审美与文化内涵,如表现儒家文化故事的“桃园结义”“耕读传家”“二十四孝”,表现道教文化的“暗八仙”,表现吉祥寓意的“竹鹿同春”“路路清廉”“喜上眉梢”等,充分展现了近代商人的精神气质和理想追求。

(三) 科举会馆

科举会馆,也叫试馆,以教育功能为主,是古代科举考试时各地考生在京城、省府乡试考场附



图 2 福州古田会馆

Fig.2 The Gutian Guild Hall in Fuzhou

近的居住场所。自隋唐起,中国封建王朝选拔人才的途径主要实行科举制。明清的科举制度更加严格,分为三级,由乡试、会试、殿试组成,其中乡试在各省首府举行,每三年一次,这是学子寒窗苦读迈向仕途的第一步,也是壮大本乡籍政治力量、荣耀宗族的关键。因此,各省地方府、县对乡试都非常重视。为了让这些身处异地的同乡学子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准备考试,一些有权有势的同籍乡绅和一些富商联合集资在省府乡试考场附近置购房产,作为本籍同乡学子留居之所和交流学习的地方,进而发展为科举试馆。同时,这些试馆也具有一定的社会管理功能,对学子的行为习惯起到约束和监督的作用。明清时期福州的科举试馆一般面积不大,主要集中在书院、贡院周边,很少为人所知。正像福州著名历史学家傅衣凌先生所说:“一般方志既不提当地在京师所建的会馆,更自忽略当地童生赴府城考生员而设的府城试馆。”^{[1]15-16}但这些为科举而设的试馆的确为当时的考生提供了许多方便和心理宽慰,如在原福州贡院附近的永定试馆、永泰试馆等。还有一些财力雄厚的家族,则购建了族姓试馆,为自己家族的学子提供更好的服务,例如清代连城县就有罗、黄、张、杨等十余姓氏家族在福州设馆,以便其子弟可以提前到省府,静心准备,就近入考。

二、福州明清会馆的城市分布形态

明清时期,随着商业贸易的不断发展,福州城的区域职能分工愈发明显,并逐步形成“北城南市”的基本布局。^[2]这种布局特点也使得不同类

型会馆根据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需要进行城市的选址分布,体现出对城市近代化发展的适应性特征。

从人文政治的角度来看,位于城北的鼓楼自古就是整个城市的权力中心和行政中枢。明清时期,这里汇集了福州府署、布政使台、按察使台、总督部院等行政机构,这些机构掌管福建省的财赋、民政、司法、军政、史吏等。^[3]同时,鼓楼也是文化教育和宗教中心,有文庙、贡院、书院、提督学院、各大宗教建筑等,这些机构与科举考试、民间教育、宗教祭祀等息息相关。其核心区三坊七巷还是官绅、富商、名人雅士集中居住的地方。为了能更密切地维系与这些达官贵人的关系,扩大地方或家族的影响力以及方便子弟科举考试,跻身仕途,许多地域的行政会馆和科举会馆都集中分布在鼓楼,如八旗会馆(鼓楼区道山路)、两广会馆(鼓楼区石井巷)、湖南会馆(原鼓楼区保定巷,现迁至杨桥中学内)、建宁会馆(鼓楼区南街郎官巷)等。

从商业贸易的角度来看,位于城南的台江、仓山横跨闽江两岸,水陆交通便捷,商船经闽江短暂航行即可到达出海口。明末清初,福州自然泊船的港口码头也逐渐由西部的洪塘南移至闽江下游两岸。优越的地理环境和交通条件让沿江两岸地区迅速成为了福州的商业贸易中心,商业异常兴盛。伴随对外贸易量迅速增长和大量的资本积累,城市商贸活动不断扩大,闽江两岸汇集了众多服务商业贸易的会馆、洋行、仓库、商铺等机构,并最终发展成为规模庞大的工商专业街市。开埠后,这里成为闻名全国的大宗货物集散的枢纽,商业贸易日益繁荣,最多时曾汇集 500 多家商行,经营包括茶叶、药材、绸布、京果、烟草、糖酒等 500 多个品种货物,商品销往全国乃至海外。为了更方便快捷地服务和协调这些内外商贸事务、处理行业问题,各地域商帮纷纷在台江、仓山两地集中兴建商业会馆,如古田会馆(台江区宫前路吴厝垵)、安澜会馆(仓山区仓前路解放大桥桥头,见图 3)、福清会馆(台江区福清馆巷)、江西南城会馆(台江区上杭路)等。

此外,部分地方会馆还会出现一城多馆的分布形态,这主要由其商业贸易需要所决定。如绥安会馆,老馆位于鼓楼南街郎官巷,称绥安内城馆,而后又在台江上杭路兴建了绥安南城馆。



图3 福州安澜会馆

Fig.3 The Anlan Guild Hall in Fuzhou

三、福州明清会馆的社会功能

福州明清会馆不论从建筑样式还是文化形式、功能性质都和中国传统宗族祠堂十分相似。祠堂为同宗族祭祖、处理事务和聚会的地方,这是宗亲意识和家族凝聚力的集中体现。会馆则是同乡祀神、处理事务和联谊的地方,是宗法共同体的同籍人们的一种精神支柱。从宗族到民系、乡系,无论是规模还是影响力,后者都明显更大,它承载着“祀神、合乐、义举、公约”等诸多社会功能。

(一) 奉祀神灵

在会馆的建筑设置中,神灵设置是保持其完整性的首要条件和重要部件,会馆神灵是明清会馆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它凝聚了社会环境的熔冶,也规范了会馆的发展方向。^[4]因此,会馆传统的祀神仪式活动是其诸多社会功能和人们精神需求最重要部分,而且是深层次意识习俗的体现。奉祀活动不仅是大家的精神纽带,同时也是地域文化特色的象征。福州明清会馆的神祇设置与传统类型的宗教信仰不同,它不分宗教派别、真实虚构、高低贵贱,更多注重神祇的精神气质,并表现出崇拜乡土神的风俗性地方色彩,以及期待着或认定了的神灵“灵验”的实用性功利动机。^[5]例如古田会馆、安澜会馆、建宁会馆、南郡会馆(台江区下杭路)都把海神妈祖作为主神供奉,希望将妈祖仁慈、孝顺、博爱、坚韧、勇敢、乐于助人的精神发扬光大,并求妈祖庇佑生意一帆风顺。又如江西南城会馆把为民除害的乡土神许逊许真君作为崇拜的神灵对象。此外还有供奉尚书公、延平郡王、关帝、开漳圣王、保生大帝等。有时会馆还

会呈现诸神并祀的现象。如从古田会馆留存的石楹联“慈航普度观音偈,孝水流芳曹女碑”中就可以推断观世音、曹娥、古田陈靖姑等诸神也在共同的奉祀之列。^[6]

(二) 联络乡谊

“聚乡人,联旧谊”也是会馆重要的功能特征。各地商人客籍福州,关山阻隔,交通不便,身处异乡的商人、学子等长时间在外无法回家,时常伴有一种孤独感和思乡的情节,尤其节日的时候这种感觉更加强烈,所谓“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会馆的设立为同乡之间的联系建立了一个良好稳定的平台。以“不聚涣散,无所联属”为由,每逢“馆庆”、神诞或传统节庆礼俗的日子,会馆都会根据本地习俗举办一些大型的民俗文化活动,如举行烟花灯会、猜灯谜、演戏酬神、吟诗和唱、游神等^[7]¹⁹⁰,使大家在一起更加亲近,更加团结,真实地体现了“会馆之设,以睦乡谊”的作用。如兴安会馆每两年一次在正月十八都会隆重举办尚书公“出海”的大规模“乡庆”庙会活动,届时在福州的莆田籍官员、商人及各界人士等都会云集于此,聚集宴饮,场面庞大,热闹非凡。

(三) 倡导信义

在中国商品经济初始化发展阶段,存在着许多不正当的竞争和不规范的市场行为。会馆的设立,特别注重商人群体道德规范的培养与完善,起到很好引领作用。传统的从商之道,推崇“忠义诚信”“义中取利”,提倡商人要有为公众、乐于奉献、疏财仗义的仁义精神。例如时任福建商务总会总理的福州富商罗金城,经营钱庄、进出口商行、木行、典当行、运输公司等多项业务,富甲一方,但其为人谦逊,热爱公益事业,时常救急济贫。他曾说:“富人能够得到人们的敬重,正因为他能够尽力帮助别人。如果积金不散,即使金银如山,这和收存废物有什么两样?”^[7]¹⁴⁰正是通过像罗金城这样几代商人的努力,大到捐资办学、修桥铺路、救济灾民,小到为遇到生活、生意困难的同乡学子或商贾提供精神和资金上的帮助等,体现了“敦信尚义”的优良品质,也因此逐渐提高了商人社会地位和存在感,同时对明清时期福州的行业规范和社会进步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 规范管理

商业活动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合理有序的管理机制是商业活动进行的必要保障。明

清时期中央政府对工商业制定了相关的政策法规,但地方官府往往落实不到位,使这些管理规范形同虚设,尤其在清代中晚期社会动荡,商人的利益常常受损。从清道光二十四年福州成为“五口通商”口岸后,福州的商业贸易步入了快速发展期,同时官民矛盾、行业矛盾、社会矛盾等各种复杂矛盾接踵而来,因此,由官民共同参与的地方社会管理就凸显了其必要性。会馆作为各行业阶层、各大商帮共同认可的社会团体组织,能够有效地整合这些管理功能。他们常常会推选一些德高望重的长者、官绅或商会会长作为会馆的“客长”,主持本地区管理事务,制定大家共同遵守的公约制度,规范行为,协调内部的矛盾与纠纷,并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成为封建社会管理体制的有效补充特征。如宣统年间,作为福建省咨议局议员的福鼎人孔昭淦被福鼎商界推荐为总理,主持建立福鼎会馆和与洋商交涉事务,为家乡士商争取最大化利益。又如寿宁会馆成立有馆务委

员会,每年清明前都会召开馆务首次会议,研究讨论商会业务发展和会馆全年工作计划,并于清明当日主持筹办同乡宴会,起到沟通感情、凝聚人心的作用。

可见,会馆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晚期产生的特殊民间社会组织,具有其时代的进步性特征。

四、结语

福州明清会馆建筑是福州重要的古建遗存,由于社会发展变迁,它们早已不再适用,但作为福州历史文化和商业贸易发展的见证者,它们又是明清时期福州城市向近代化发展的一个历史缩影和文化载体。以保护文物和发扬文化自信的态度,对包括福州明清会馆在内的历史建筑遗存进行深入普查研究,并且通过合理的活化应用,发挥这些历史建筑遗存的当代价值,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 王日根. 会馆史话[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 [2] 张复合. 中国近代建筑研究与保护(一): 1998 中国近代建筑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9: 288.
- [3] 朱永春. 福州近代建筑史[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7: 7.
- [4] 王日根. 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6: 280.
- [5] 陈东有. 明清时期东南商人的神灵崇拜[J]. 中国文化研究, 2000(2): 46-51, 145.
- [6] 杨琼, 孙群, 柯美红. 福州古田会馆的建筑艺术理念及其表征[J]. 艺术与设计(理论版), 2017(8): 63-65.
- [7] 福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上下杭史话[M]. 福州: 海峡书局, 2013.

(责任编辑: 王圆圆)